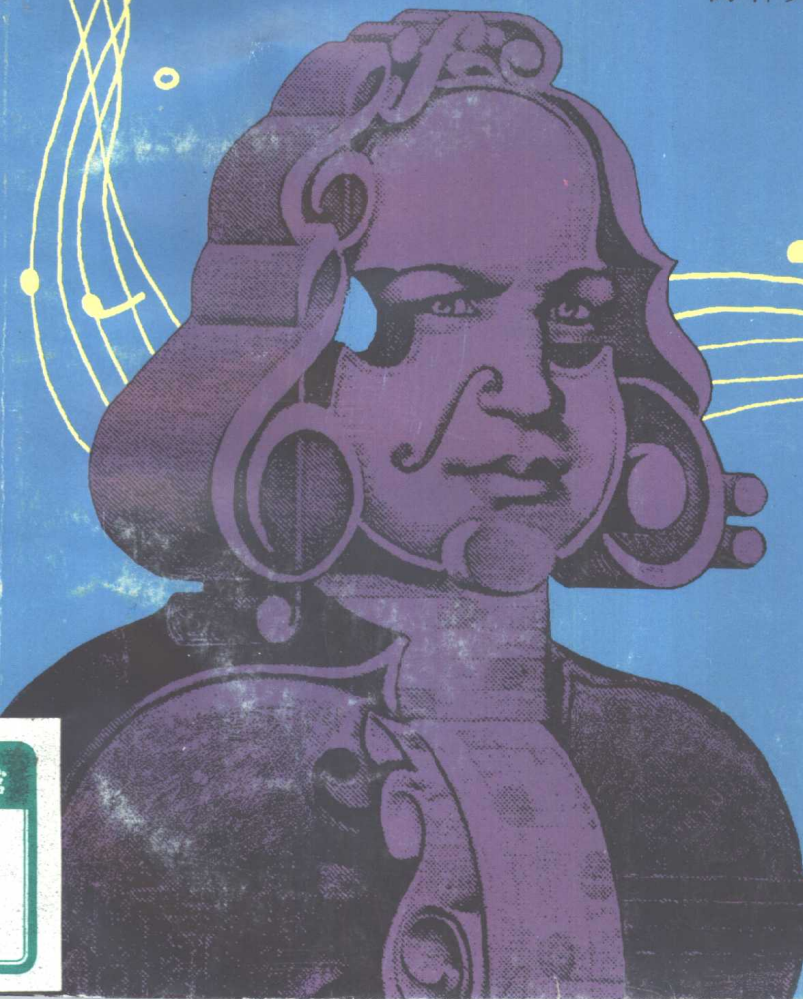


罗森多夫 四重奏

[以色列]内森·沙汉著 陈伟光译



I382
2
1

罗森多夫 四重奏

[以色列]内森·沙汉著
陈伟光译

086494



女子学院 0001590

花城出版社

b

Copyright (c) by Nathan Shaham
Worldwide Translation (c)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
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Ramat Gan, Israel

罗森多夫四重奏

〔以色列〕内森·沙汉 著

陈纬光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勘
测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1插页 258,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136-4
I·1840 定价:14.40元

内 容 提 要

四个德国犹太人，都是从纳粹德国出来的难民，也都是—流的音乐家，30年代来到了巴勒斯坦。他们在那里加入了一个交响乐团，虽然这个乐团的成员都是欧洲人，但整个乐团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宣传工具。他们四人在大杂烩式的交响乐团里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于是他们就聚在一起，建立了罗森多夫四重奏乐团。在这部引人入胜的、煽情而又令人信服的小说中，内森·沙汉对这些犹太难民的境况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这些犹太难民，必须要适应这个新概念与旧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政治斗争和暴力威胁的地方。这部小说获得了在以色列享有盛誉的“比阿利克文学奖”（Bialik Prize for Literature）。

库特·罗森多夫，既是四重奏乐团的指挥又是其中的首席小提琴手，他相信，音乐是她的祖国，在被迫离开他在柏林的信奉基督教的妻子和女儿以后，她适应不了在巴勒斯坦的生活，因而努力要生存在“历史与地理”以外”。康纳德·弗里德曼，乐团的第二小提琴手，是一个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不断地进行斗争，声言要放弃一个音乐家的欧洲文化生活方式，并致力于犹太人的事业。伯纳德·利托夫斯基，乐团的大提琴手，是一个具有家庭观念的人，他对流浪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渴望着能在一块坚实的土地上定居。乐团的第四位成员是绝色美人斯多本菲尔德，她的美貌和性解放观念，使她的同事们既困惑，又入迷，她因为能远离自己过去的苦况而松了一口气，但又因为碰巧生为犹太人因而生活前途尽毁而

异常愤怒。

把这四个人撮合在一起的，是伊冈·勒文索尔，一个聪明但不知名的德国作家，他是一个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但却不能离开迫害他的人的那种语言，他决定，用德语写的下一部小说，将是关于这个四重奏乐团的。

《罗森多夫四重奏乐团》不但精彩巧妙地描写了导致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诞生的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方方面面，而且对音乐治疗心灵创伤的力量进行了令人拍案叫绝的赞颂，在音乐王国中，纷争、政治、个人苦恼，这一切，都融汇成艺术，超越了人类冲突，超越了国家界限。



作者简介

一九二五年生于特拉维夫。自一九四五年起为基布茨·贝特·阿尔法成员，并三次任基布茨书记。现任西弗里亚特·波阿里姆出版公司总裁，他以散文和剧作出名。



AAB59764

首席小提琴手——库特·罗森多夫

“平静的大海，热闹的旅游。”在当今的德国，门德尔松的命运与我们的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他们不可能把他从《大英百科全书》中删掉。

晴空万里，一片蔚蓝。只是大海有些深沉，现出一片黯蓝，蓝得发黑，似乎昨夜的风暴仍在其深处折腾着。海浪轻轻地拍打着船身，却连泡沫也懒得泛起。轮船的机器声奏出一个降E大调和弦，与四周的蓝色非常合拍。蓝色是向往绝对化的颜色，那是友谊共济会的主题。

我愿意相信，到处都有可能找到朋友，即使是在一个文明程度低下而政治热情高涨的国家里也是如此。在沙漠里演奏莫扎特的乐曲是一件怪事，淡淡的忧伤，弥漫在他的一部根本算不上是“大调”的作品之中——小提琴、中提琴交响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弦乐四重奏——就好像他根本不相信那些曾经发誓要互相忠诚于对方的人们之间的友谊。

我要写信告诉家人：甚至轮船的机器，也奏出友好的音符。这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言，因为没必要让他们担心。要我在出发后在途中写的第一封家信中，告诉家人说我很担心，而这种担心是出于我那笨脑袋的，这实在是一件蠢事。而事

实上，我过去每逢出游，都兴奋不已，就好像一个小孩头一次单独出门似的。可这一次我是走在导致我的生活发生剧变的旅途上，自己却毫不在乎。因为风暴的缘故，我两天没碰小提琴，这比起前途茫茫更令我不安。说来奇怪，一种冷淡漠然的感觉正向我袭来。我正前往参加当地一个慈善交响乐团的演奏，同时也在为前途而担忧。不过我同时也像一个去度假的游客那样坐在船上。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也许是因为我要动员全部内在的力量去迈出第一步——离开家园、离开家人、离开朋友、离开祖国——对于前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动员的了。我的思想被拖回到过去的时光，我不敢想象在砂子上建立起来的破旧城镇中如何面对生活，在一个没有歌剧院，没有教堂而且过分膨胀的地中海村庄里，一个交响乐团是不可思议的。

我从未见过一个二十八年前才建立起来的村庄。从明信片上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个村庄认出来。一条街道通向一座有歌特式拱门和塔楼的建筑物，街的两旁是一些小房子。我曾想过：多奇怪，一座围绕着中学建起来的小城镇。

我不敢想象有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

格莉塔说：“没有我，你可以活下去。但没有四重奏乐团却不行。”

我对她说：“你知道，我到那里是为一个管弦乐团演奏。”

她关切地看着我。我还没出发就降低标准了，我已经开始用一个遥远的移民国家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似乎是预见到我的蜕变，她的脸上一副极端失望的表情，这表情不是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她丈夫的性格引起的。她甚至没想过要请我改变主意，她不想和一个顽固分子争论，这个顽固分子往

往把自己的决定作为神圣的原则。一旦我们决定要分开一段时间，一段遥遥无期的时间，也就没必要争论了。争论只能造成伤害，而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当我和伊冈·勒文索尔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这位著名的作家对于我这样一个人也准备去巴勒斯坦，似乎感到很受鼓舞，这意味着在那个地方有机会找到一种文化氛围。但是，我从他的脸色看出，对于我与妻子之间所作的安排，他有所怀疑，他怀疑我们是否能再一次团聚。他说，希特勒不是德国早晚可以甩掉的匆匆过客，那只是想想而已，不是事实。希特勒受到德国人的欢迎，要打败他，只有靠外部力量。不幸的是，没有这样的力量。西方愿意做一切的事情去纵容这个狂人，而对于难民厄运的预言，却不能让他们改变主意。

我们只是谈到政治问题，虽然他使我看得出来，他还可以想象出其他的原因让夫妻自愿分离，可是他不会强加于我。人们总是要把他们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告诉别人。他的假设是对的，如果我和妻子分别是有什么非政治问题的话，对这些问题，我也会秘而不宣的。

性情上的差异，像性问题一样，是难以描述的，不可名状的。我们从不知道，我们过去因为压抑造成的不幸有多重要。毕竟，眼前这种麻木不仁的感觉是很可能出现的，人们把这称为常识。

我与格莉塔在性格上的矛盾是简单、明确的，就算是陌生人也看得出来。毫无疑问，正统教派将把我们的分离归咎于异族通婚注定要失败。因为从其它任何角度来看，我们这一对似乎很有把握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我们都是音乐家，地

位大致相等，同时又各有各的圈子，不存在竞争，也没有谁依靠谁的问题；我们都醉心于音乐，醉心于好书，致力于对女儿的教育；我们都不受放荡不羁的文人生活的诱惑，即是一种使人自己背叛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没有极端的见解，那样的见解能够动摇互相理解的坚实基础。我们都很勤劳，知道如何努力工作，勤俭节约，未雨绸缪，我们三言两语就能互相了解，对于可能引起误解的话，我们却能够体会到一种直率的幽默。

然而，不和谐音依然存在。

尽管我们都小心谨慎地避免，不和谐音还是会出现，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宗教背景不同。这一点，格莉塔讲得很清楚。在我们为一些避免不了的小事争论一番以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她把我的顽固归咎于我的犹太教背景。

“你是坚定的犹太教徒，就像我是坚定的基督教徒一样。我们不属于同一个‘音级’，那为什么让这无聊的东西插足进来呢？”

在敏感程度上，我们有很大的差异，就艺术家而言，这足以令人烦恼，令人失衡。

虽然她从来没这样说过，可我感到，格莉塔讨厌我的过分敏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她还把这一条作为我是一个“不成功”的艺术家的原因；我从来就对“杀出一条血路”式的竞争不感兴趣。在她看来，正是这个原因，我没有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独奏家，而只不过是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为弦乐四重奏乐队能在小音乐厅里演奏就心满意足。

令我痛苦的是，她不能理解室内乐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没有把精力集中来争取独奏家的地位，这样就不用担心那些

令人神经紧张的冲突。当然了，我也会不时地放开室内乐去演奏小提琴协奏曲。室内乐，是自我与认知集体力量至关重要性之间的妥协，向不懂得它的和谐音的人解释室内乐，是很困难的。

我不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格莉塔对我的失望，不但来自我的谦恭羞怯，这种谦恭羞怯在她看来，是与我们本身感到幸福的气质不相容的：我们两人都有天份，样子漂亮，观察力敏锐，勤奋用功，又生长在一个能够赏识音乐才华，勤奋品德和希腊古典美的国度。她还对要教育我勇敢地站起来维护自己而感到厌倦。有时候，她会绝望地看着我，我什么时候才会长大？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音乐生涯不可限量——任何女人跟他在一起，都可以把他捆在小指头上，随心所欲地让他服服帖帖——就算这个女人是那样的轻薄、愚蠢、粗俗。我又没有能力让别人认识到，我的地位赋予我一个中心位置，其他人全都得围着我转。

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其它问题。我也可以加上这样一点：当我遇到有人——一位崇拜者或者是为我漂亮的外表而倾倒的姑娘——向我卑躬屈膝，我会尴尬得无地自容。我会立刻寻找他们超过我的地方，我开始谈政治，谈烹调，谈养儿育女，谈文学，天知道还谈些什么，总之不谈音乐。

也许我真的是过分敏感，怕自己惹人注目——这是我父母遗传给我的犹太人的特征，我也不能够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有一个例子可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虽然这个例子本身并不重要。

我们在柏林有一间小公寓，位于柏林爱乐交响乐团附近

的一条小街上，那里的房产价格很高。公寓虽小，也够三个普通人居住。可是当三个人都要练习的时候（我们的女儿安娜弹钢琴），问题就来了。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的，尤其是在一家人当中，当卧室的门被关上，噪音就被隔开，我可以在厨房里拉琴。白天的时间也可以合理地分配。在三个人当中，格莉塔被认为是最敏感的，因为有什么东西比声带更敏感呢？她可以把自己关起来，什么都不管，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而需要稍微热身以便进入状态的我，却被微不足道的小事搅得烦恼不堪：街上的声音，安娜情绪不好，格莉塔那边静了下来，等等，等等。我可以在弦上拉着弓，手指来回地按着弦，可是不得要领，精神不集中，没有灵感，缺乏共鸣。

格莉塔认为这是一种病态。开始的时候，她把我去城外一位朋友弃置的屋子里拉琴，看作是一种放荡不羁，装腔作势的举动。后来发现我那样做是认真的，她感到非常失望。如果我那样做只不过是装模作样，她反而会好过一点。如此走火入魔似的敏感，在她看来，简直是神经病。准确地说，不是神经上的疾病，而是精神上有毛病，是一种由过分挑剔造成的神经衰弱症。对于这样的毛病，她也有她的治疗方法：正如人们让脸色苍白、娇生惯养的小孩到大自然里进行体育锻炼一样，她的办法是通过由她引起的挑战性的冲突来加强我那非常脆弱的精神状态。她的办法是一个糟透了的错误。虽然她是闹着玩，可我不能接受这种蓄意的困扰，企图强迫我参加一声游戏，以便强化我的性格。

最近——不过太迟了！——她不再这样做了，她对我不抱任何希望了。虽然她非常小心地不说出来，但是我觉察到

她把这一性格特点归咎于我的“犹太人本性”。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心注定不得安宁，我们真可怜。我们没有机会改变，起码在我们这一代没有。至少我们的女儿将免遭这种命运的捉弄，因为她的血管里流着巴伐利亚发夫的血。

我没有受到强化精神的战斗训练，而是开始接受一些小小的例子，看看一个成熟的人是怎样控制他的情绪的，这是一些组织得很好的关于控制局面的演示。带着装出来的欢快，她会把自己投进尴尬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她那高人一等品格就表露无遗。一旦因为琐碎小事引起争吵——有谁不会因为误会或秘而不宣的紧张关系而不被拖进这类争端呢？——她的双眼就会闪耀出光芒，就像小孩发现新宝藏一样：这可是个机会，她证明我们两人当中谁顽固不化，谁宽宏大量。明明我是错的，她却让我赢了，她该有多高兴！她会躺在奥林匹斯高峰上精明地看我一眼。她的宽宏大量没有白费，而且有教育的目的。她在逐渐地塑造我的性格，我仍然有机会成为坚强而乐观的生灵。

我不得不承认，性格上的冲突，没有减低我们从对方身体上得到的快感。在床上，所有不和谐音都解决了，一切都以一个强有力的和弦，一个“大调收束”而告终。我们经常把日常的失望带到做爱中来，又在对方的怀里很内行地使失望之情消退得一干二净。在没能演上《暮色神灵》的角色时，她是多么的甜蜜、可爱！在肌肤骚动翻腾之中，我们完全融为一体。然而，虽然我们互相配合，有能力进入一种令人愉快的忘掉一切的境界，做爱的时间多长，这种境界就持续多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觉得有必要暂时分开。“重塑自我”是我们之间取得的默契。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思

念对方——我们从未定下这段时间有多长——为的是再次团聚，像我们在一起和头几年一样亲密无间。

政治因素也促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尽管在开始时这些因素的影响刚好相反。强烈反对希特勒思想的格莉塔，觉得有必要显示她与犹太人站在一起。虽然她是明目张胆地这样做了，但是丝毫没有令人感到温暖。有时候我想，她是在利用事情的这种可悲状态，来把记录摆平：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有人提供恩惠，有人需要这种恩惠。

不管从哪一角度看，休伯曼要我参加他将在巴勒斯坦成立的交响乐团的邀请，都来得非常及时。我刚刚被柏林爱乐交响乐团辞退了，而罗森多夫四重奏乐团——三个犹太人，一个纯雅利安人——完全没有机会靠音乐维持生计。在德国，我们受种族法的管束，在国外，这个乐团并不出名。虽然我们在利物浦和斯特拉斯堡分别开过一场音乐会，并小有名声，但却亏了大本。我们还出过一张唱片——那是匆忙而马虎的录音——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在国外体面地生活。我在法兰克福交响乐团当独奏演员的表演，也不足以确立我的地位，在西盖蒂犯了策略性错误只有一年以后，我在那里演奏过勃拉姆斯的作品。

巴勒斯坦似乎是一个极好的临时庇护所。

格莉塔则认为那是一个荒唐的想法。

“如果你去英国，去法国，我们还有机会团聚。到那里确立你的地位（这是她爱挂在嘴边的说法之一），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可以来与你会合。”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她决不会去巴勒斯坦。这并非因为那里是犹太人的庇护所，她对犹太人没有偏见，要不她怎

么会嫁给一个犹太人呢！她也因为公开谴责反亲犹太主义而危害到自己！也并非为了她自己的音乐生涯而认为巴勒斯坦不屑一顾。她已准备放弃进取计划而乐于当一名歌唱教师。如果休伯曼成功地把乐团建立起来，并有好名声，她也会偶然参加乐团的演出。但是，她怎么也不会拿安娜的前途去冒险。“要把安娜这样一枝鲜花插到沙漠中间，是绝对不可能的，”她说道。

安娜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好的音乐天分，十四岁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音乐家。她有精妙的技法，能专心致志，尤其重要的是，她有杰出的个人表现力。如果坚持下去，加上一位好教师，她毫无疑问会有一个辉煌的前途。

他们说那里就有二三位合适的教师，格莉塔知道他们的声誉，但她认为他们不能提供安娜所需要的那种“文化氛围”。进一步说，她认为安娜那样高水平的年轻艺术家，如果没有年龄相仿的年轻音乐家为伴，是不能提高水平的。

也许，她是对的。德国是一个让青年艺术家的天分得以充分发挥的地方。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暂停”也会有好处的，没有一个犹太人父亲在背后，安娜的机会将会更好。

但是，在的里雅斯特的时候，思乡病无情地向我袭来，就像一块硬硬的东西压在我的心坎上。那种痛苦摄走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使我精神恍惚。我对自己说，这是一种必要的牺牲，一位严肃的音乐家没有私人生活可言，你得接受这个事实。莫扎特还没到八岁就离开了妈妈，开始到处漫游。

在船上，我开始怀疑我们的牺牲有没有白费。

见到伊冈·勒文索尔本来使我满心欢喜，后来也产生了

意想不到的痛苦。虽然他小心翼翼，尽量不说出来，可我还是看得出，他怀疑这样一种假设：纳粹分子不会因为她的父亲是犹太人而伤害一位有天分的姑娘。他所说的是：“我怀疑我们当中谁也说不上这些人会干些什么。”

很明显，他了解像我这样仅仅是失掉工作的人们，能够做的只是猜想。

他是在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之一。

* * * * *

我是在海上的第二天在甲板上遇见他的。他认出了我。1931年底他曾听过一场罗森多夫四重奏音乐会，他还记得我的面孔（“一副不会忘怀的面孔，”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他走过来告诉我，他是多么欣赏（那是五年前的事）舒伯特的A小调四重奏，那是他特别喜欢的一首四重奏曲。他含糊不清地介绍着自己，我没想到自己正在与一位著名的作家交谈，这位作家就是《古老的荣耀》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我一直很喜欢。

在我认出他以后——主要靠他那不寻常的说话方式——他又一次令我吃惊。像他这样一个人，历尽沧桑，却会因为我记得一本书而大为感动，这本书在刚出版时并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被公众拒绝的书，我尤其容易动感情，就像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一样。”他笑着对我说。

我觉得他可笑，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对他的恭维，竟然使他兴奋起来。我也喜欢那些不明就里的人所作的赞扬，但真正使我兴奋的，是对严肃音乐家的认同、赞赏。也许那是因为我们见面的环境所致——在一艘载着我们到一个并非我

们选择的国家的船上，我们都显而易见地为前途茫茫而担忧。

在好些方面，他的担忧比我的恐惧更合情理。两人的情况绝不一样：我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等着我，有工资，有一种还算稳定的生活。他什么也没有。（一份瑞士移民报纸作过含糊不清的承诺，他在那里有一位当秘书谋生的女友。如果他能定期写出文章，下一年他们就支付固定工资给他——大概是管弦乐团小提琴手工资的一半。）我有音乐，这是一种世界语言，灵巧能干的手指，有一把好小提琴（一把瓜达尼尼小提琴），还有稳定的观众（一个“爱乐之友协会”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他无把握为自己的书找到出版商。（没有一种语言的作者，就像手指断了的小提琴手一样。）

谈到工资，我问其他乘客，二十镑一个月，能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得到首席小提琴手位置的话），或者十六七镑又怎么样（如果他们有更好的小提琴手的话）。我知道，我的担心是愚蠢的，但是，在茫然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尽量了解细节以求得到可靠的东西。有人说每月有二十镑是一份福气。可是，这个人“基布兹”——犹太人定居运动组织——成员，刚刚完成在国外的使命而回去，他看问题的方法会令任何未挨过饿的人感到高兴。至于我问的第二个人，他不无尴尬地笑着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充满了怜悯之情。他是一位在德国学医的阿拉伯人，他的家人都是富翁。二十镑，大约是他塞进夜总会舞女胸窝里的数目。

我和伊冈·勒文索尔初次见面就油然而生的“友谊”，正如那种在疗养院里相识，离开时大家都痊愈了的情况，它来自我们都有的一种孤独感，我们同在一条船上，船上的乘客搭配失当——外来的移民、回归的居民、政府的官员——互